

中国稻作文化东传日本探源

金 健 人

作为日本列岛的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稻作文化，一般都承认是中国稻作文化的东传，对此很少有人持异议。中国的稻作文化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对此也很少有人不赞同。然而，中国的稻作文化到底从哪条路线传入日本？对此则众说纷纭。其中牵涉的问题很多，最重要的可归结为两个：一、稻作文化从中国传到日本是否必须经过朝鲜半岛；二、如果说稻作文化从中国传到日本列岛必须先经过朝鲜半岛，那么，是经过陆路还是水路传到朝鲜半岛，然后再到日本列岛的？而解决该论争焦点的关键则是：三、四千年前的航海条件是否可能让人直接从中国江南渡海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对这一发生于史前的中韩和中日的重要文化现象的探讨，其实关系到东亚诸民族的人种交融、文明发展以及文化走向等重大问题的研究。

—

根据考古资料，中外学者普遍承认长江中下流地区是中国稻作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便是河姆渡文化。河姆渡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年，在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乃至世界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都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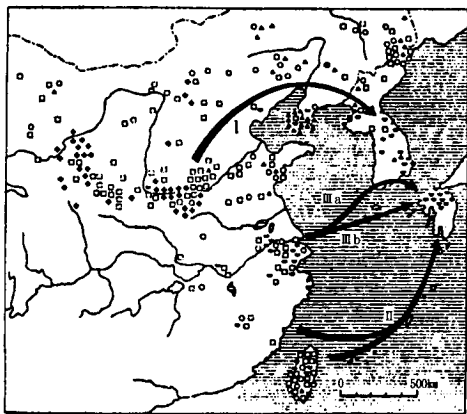
栽培稻。游修龄提出可以把太湖地区以水稻种植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序列区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河姆渡文化（第三、第四文化层）距今6000-7000年，以夹炭黑陶、少量彩陶为特征，主要分布在宁绍平原东部。第二种是马家浜文化，距今5000-6000年，以夹炭红陶、泥红陶为特征，分布在太湖周围。第三种良渚文化，距今4000-5000年，以夹细砂的灰黑陶、黑皮陶为特征。浙江境内的良渚文化密集在太湖流域，向东一直延伸到东海之滨。江苏境内的良渚文化遗址目前已发现54处，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大体上和浙江、上海一带的良渚文化遗址一致。⁽¹⁾另据1997年的《钱江晚报》报道，它以《湖南发现世界最早的稻田》为题，认为湖南省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的发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把中国建城的历史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特别是在该遗址发现了6000年前的世界上最古的水稻田遗址，进一步证明了包括洞庭湖区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文化在世界上的最早起源地位。“距今6000年前的水稻田是因压在大溪文化城墙下而被保护下来的。田面平整，灰白色沃土厚约30多厘米，挖出两条田埂非常规则、清晰，在显微镜下，泥土中的水稻稻叶和稻壳的硅质体清晰可见，其单位面积内的数量与现在的水稻田基本接近。稻田附近还有水沟，水塘等灌溉设施，说明当时的稻作栽培种植水平已十分发达。毫无疑问，它与江苏吴县草鞋山发现的水稻田同为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稻田，反映了洞庭湖6000年前已进入较成熟的稻作农业经济阶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²⁾

关于江南是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地，这在考古学界已成共识。严文明在《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一文中认为：长江下游及其附近是中国栽培稻起源的一个重要中心，稻作农业的发展是以此中心出发，像波浪一样逐级向周围展开来的。⁽³⁾1989年，严氏又根据80年代以来各地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的大量新资料，撰成《略论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和传播》一文，在重申旧说的同时，他还根据对迄今已知的近70处史前栽培稻遗存的年代顺序，勾画出一幅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和传播的路线图。⁽⁴⁾他认为，公元前约5000-4000年的时候，中国栽培稻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和杭州湾的一小块地方，以及长江中游几个

零星的地点；到公元前约4000-3000年时，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狭长地带已普遍种植水稻；进入公元前3000-2000年之际，稻作文化已有很大的发展，向南扩展到湖南、江西中部和浙江中南部，前锋到达广东北部；向北则扩展到淮河流域以北；降至公元前约2000-1000年间，稻作农业的分布区进一步扩大，南至福建、台湾、广东、四川和云南，北到山东、河南和陕西，已经基本接近现代水稻分布的格局。

日本最早的稻作遗址见于北九州的板付。板付型陶器是日本早期弥生文化的典型遗物。该遗址的发掘证明，北九州在绳文晚期已开始有稻作，出土有炭化的稻谷；时间约距今3000年。中、日两国大多数学者认为，日本的稻作文化渊源于中国稻作文化的东传。一些学者对已发掘的稻谷、稻米和稻谷压痕进行研究，认为弥生时代日本种植的稻谷，同江南地区发现的稻谷极其相似。⁽⁵⁾ 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从长江下游的浙江省到济州岛、朝鲜半岛、日本西北，是中国稻作文化东传的最适当的路线。⁽⁶⁾ 确实，学者们普遍认为日本稻作起源是受中国大陆的影响，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日本史前稻作是从“哪里”（where）、是从“什么”（what）途径传入的？

迄今为止所认为可能的途径有三条：一是北路，经由华北，过朝鲜到日本九州；二是南路，由沿海的岛屿台湾、琉球等传到九州；三是中路，由长江口先至南部朝鲜，再至九州，或从长江口直达九州。佐佐木高明为此以几种史前石镰的分布为依据画出了稻作文化从中国东传日本的示意图⁽⁷⁾：



稻作传入日本的三种可能途径（佐佐木高明）

- 长方形大镰 ○ 半圆形直边石镰 + 带齿石镰
- ▼ 半圆形凸边石镰 △ 纺锤形石镰

游修龄将中、日各学者的论点综合起来，归纳为以下四点：

1、半圆形凸边石镰，日本学者称作日本石镰(图中黑半月形)，是日本新石器弥生时期的特征石器，广泛分布于日本及朝鲜和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日本考古学者认为这种石镰是随稻作从长江口直接跨海沿图中Ⅲ b 这条路线传到日本的。

2、日本学者收集了亚洲不同地区的766个水稻品种，分析其酯酶同功酶的酶谱，结论是亚洲的中部(云南、泰缅、印度东北)的品种变异范围大，是水稻的变异中心，亚洲南部和北部的品种变异比较简单，是水稻传播的扩散地区。据酶谱的变异范围和“地理渐变”的特点，推测日本的水稻品种可能由中国的长江口传至日本。

3、安志敏从文化遗物如玉、漆器、干栏式建筑等方面进行比较，指出日本的石玦(一种块状耳饰)是日本绳文前期代表遗物之一，它的形制同长江中下游出土玉器相似，可能是受到长江下游的影响。浙江河姆渡、嘉兴马家浜、吴兴邱城、上海崧泽、常州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吴江梅堰，武进潘家塘、南京北阴阳营等地都有玉玦出土，其形式都与日本石玦相似。日本绳文前期出土的精致漆梳，其来源也当和中国的长江下游如河姆渡等地文化有关。⁽⁸⁾ 干栏式建筑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典型土著建筑形式，日本至少从弥生文化以来已经出现了干栏式建筑，因而表现出与长江流域的密切关系。

4、日本海有来自北方鞑靼海峡的里曼寒流和来自南方的经台湾海峡、琉球群岛北上的暖流。这种南北海流的移动，曾从日本西部沿岸的漂着物上得到证实。由中国江苏、浙江直接到达日本九州的东流路线，不应局限于有史以后的遣唐使等贸易商船的来往，这条航线可能早在史前时期即已存在。⁽⁹⁾

综上所述，应该认为从中国江浙一带直接东渡至日本的路线最有说服力。然而阵文华在《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东传日本的路线》一文中说：“如果从地理位置来看，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极不发达的远古时代，最早知道浩瀚的大海对岸有一个日本岛并且能与之交往的，大概还是活跃在华北和华南沿海一带的

人们，尤其是从华北经陆路到韩半岛南端再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北九州，在当时是一条最方便、最安全因而亦是来往最频繁的路线，其次是从山东半岛经水路到韩国再转日本的路线。”⁽¹⁰⁾ 通过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草村面松菊里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在房基遗址上发现的炭化米粒，这给我们提供了证明青铜器时代已普遍栽培稻子的重要资料。”⁽¹¹⁾ 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朝鲜半岛的稻作农业遗址不断被发现，对其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据韩国学者李春宁的统计，七十年代以来，朝鲜半岛发现的有稻谷遗存的遗址有15处，除全罗南道罗州发现的是花粉之外，其他遗址发现的都是炭化米和稻压痕。⁽¹²⁾ 这些遗址中最重要的是欣岩里、松菊里和平壤市湖南里的南京遗址。欣岩里出土炭化米81粒，时间距今约3260-2670⁽¹³⁾，遗址所在地是高于水面80-100米的丘陵上，所以可能不是水田稻作。南京遗址出土炭化米250粒，时间距今约3050年，伴出的还有粟、黍、高粱等旱地作物。松菊里遗址年代较晚，距今约2715-2670年，在遗址的54号居住遗迹中出土395克炭化米，在这里没有发现旱地作物的谷粒。这些关于朝鲜半岛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现和对于日本稻作文化起源的探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如果说中国的稻作文化东传日本必须经过朝鲜半岛，那么，对于朝鲜半岛的稻作文化起源的研究就成为对日本稻作文化起源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样的话，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稻作文化东传朝鲜半岛到底是经由陆路还是经由海路？这就首先需要考察稻作文化从陆路或海路传入朝鲜半岛的可能性。

因河北省和辽宁省所有的史前遗址能发现的都是粟和黍等耐寒旱农作物，象河北省至今尚未发现稻作遗址。辽宁省的红山文化、新乐文化发现的谷物

是粟和黍。气温和水利条件都是发展水稻的限制条件，因此在考古发掘上，太湖地区以北的稻作遗址显得十分稀少。目前所知仅山东半岛的栖霞龙山遗址中发现有稻壳和稻壳印痕，该地为北纬 $37^{\circ}15'$ ，是80年代前期能知的史前栽培稻的最北界限。^[4]当然，近年在大连湾的大嘴子遗址的一座房基中发现有距今3000年之前的炭化粳稻遗存，这把史前栽培稻的最北界限推移到了北纬 39° 左右。但即便如此，还是不能推翻稻作文化无法经陆路传播到朝鲜半岛的结论。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大连湾在辽东半岛的尖端处，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如果是从陆路传播，则须经过锦州和盘锦以北的地区，而该地区则在北纬 41° 以上，从现有的考古发掘来看，史前的稻谷种植尚无此可能性。应该这样说，大连湾一带地区稻谷遗存的考古发现，尽管其纬度已往北超越了 $37^{\circ}15'$ 的传统结论，但却更让人看出稻作文化沿海路传播的迹象，因为与其说稻作文化是自山东半岛从陆路传播经由辽东湾以北的锦州、盘锦一带到达辽东半岛的可能性大，倒不如说是从海路传播直接跨越渤海海峡到达辽东半岛的可能性大。

既然从北路特别是从陆路传播的观点遇到了这样的障碍，那么从南路即由南中国沿海，经台湾、琉球等北上至九州这样的路线，也主要是一些学者从民族学方面所作的推论，比如日本有人到中国云南一带调查少数民族的食物（主要是红米糯稻）、居住、祭祀对歌和招魂等，从民俗的角度，同日本的类似民俗进行对比，认为日本文化的根应到藏缅语系各族中去找。故而得出先传入日本的应是糯稻，而且是红米等等，其路线也应是南中国海。这虽然值得探索，但到底缺乏考古上的证据，其中揣测的成分太多。

毛昭晰一直坚持认为稻作文化的东传朝鲜半岛是从长江口跨越东海和黄海是直接海路传播。他对稻作文化东传有可能性的海路作了这样的分析：第一条，从长江下游经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5]。第二条，从长江下游经山东半岛渡黄海至朝鲜半岛。第三条，从淮河下游渡黄海到朝鲜半岛。第四条，从长江下游和杭州湾地区的浙江向东直达朝鲜半岛。他分析道：第

一条路线因近年在大连湾的大嘴子遗址的一座房基中发现有距今3000年之前的炭化粳稻遗存而被一些学者赞同。但是也是在辽东半岛的大连市，在其附近的郭家村遗址的一座房址中发现了装在席篓中已炭化的粟。这告诉我们稻作农业即使在东传途中曾在辽东半岛停留，但充其量只能是“与粟作技术同时存在”，“不可能是稻作东传的主线”⁽¹⁶⁾ 第二条路线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古代山东是粟作农业地区，稻作的考古材料实在太少，栖霞杨家圈发现的是稻壳稻谷痕迹。1994年《农业考古》第1期第75页发表了一条很短的消息，报道山东日照市发现“许多碳化颗粒”，“其中10余粒为人工栽培稻籽实，可能为粳稻”，1994年1月23日，《中国文物报》关于尧王城遗址的文章中也提到这件事，但此后没有看到更详细的报道。第三条路线，淮河下游的稻作考古材料也很少，目前所知的江苏连云港二涧村曾采集到夹有稻壳的红烧土，赣榆县盐仓城遗址曾采集到炭化稻粒和东海县焦庄遗址据说曾采集到商代炭化稻粒，报道都非常简短，而且都是采集品，⁽¹⁷⁾ 根据这些材料很难作出稻作农业从淮河下游直接渡海到达朝鲜半岛的结论。“如果把上面三条路线（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淮河下游）的稻作遗址加在一起，其总数还不及朝鲜半岛稻作遗址的一半，这总使人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先秦时代稻作农业在这些地方并没有站住脚跟。我的浅见是，稻作东传的最可能的路线是第四条，也就是从江南地区渡海直接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由于这条路线海上航程较远，所以有些人认为先秦时代的人要越过这样的大海进行交往，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分析各方面的因素，这条路线实在比其他各条路线具备更为优越的条件。”⁽¹⁸⁾

第一，江南地区是中国稻作农业的发源地，这里的古代居民自进入农耕生活之时，就以稻米为主食。只有居住在江南的这样一些长期从事稻作农业的农耕民才有可能成为稻作的传播者。第二，传播稻作农业的农耕民，除了熟悉稻作技术之外，还应该具备海上航行的条件和经验。江南海岸线曲折，港湾众多，岛屿密布，为古代居民的海上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河姆渡遗址

第三、四文化层曾出土六支木桨，比河姆渡时代晚些的吴兴钱山漾遗址和杭州水田畝遗址也出土了几支木桨。这些木桨的发现，证明长江下游的杭州湾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水上航行已经相当普遍。这种航行不仅仅局限于内河或湖泊，而且早在河姆渡时期就已经发展到海上了。第三，从海流和季风等自然因素来说，江南道路也具有很有利的条件。江南东面的海流，每年1至4月从北住南。5月份开始转向东北。6至8月都是从南流向东北。从9月开始到次年4月，又从北向南。⁽¹⁹⁾而中国是典型的季风国家，特别是沿海地区，冬季多北风和西北风，夏季多南风，春季多东北风和东风，秋季多西风和西南风。在造船业和航海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借助海流和季风从中国的江南（特别是舟山群岛）用比较简陋的航海工具渡海直达朝鲜半岛，是比从山东半岛渡海更为理想的航线。⁽²⁰⁾

中国的稻作文化到底从那条路线传入日本，由严绍鏊等主编、在中日两国出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在综合分析了种种东传路线的说法后认为“各有理由，也各有弱点”。“由长江下游直接传入说的弱点，在于在当时条件下横渡东海较为困难。但若遇合适的海流及季节风，是否也会有侥幸成功的可能？经朝鲜半岛间接传入说，在航海条件上比前者说较合理些，但弱点在于北方纬度高，气温低，稻作不易成活。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发掘与研究。”⁽²¹⁾

三

任何事物的存在和传播都得以时间和空间为条件，稻作文化亦然。在稻作的起源和传播中，江南地区的地位和作用都是最为重要的。从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仅在浙江一省已发现新石器时代有稻谷遗存的遗址20处。其中最著名的有余姚河姆渡、桐乡罗家角、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畝等遗址。河姆渡遗址和罗家角遗址的年代都在距今7000年前。特别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

稻谷、器物、建筑和动植物遗存之多是中國任何一个史前稻作遗址所无法相比的。河姆渡遗址1973年第一次发掘时，在第四文化层约400平方米的范围內发现了大量稻谷、稻壳和稻草的堆积，有人估算当时这些稻谷总重量该达一百多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农具数量也很多。这些情况说明河姆渡的史前人类种植稻谷已经具有了丰富的经验，所以长江下游和杭州湾地区栽培稻谷的历史一定比7000年还要早得多。

河姆渡文化跨过江河和浅海向外扩散，这已被考古发现及研究所证实。以河姆渡遗址第四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四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存留文物中陶器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盒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2]有人甚至认为马家浜文化是由河姆渡文化发展而来，也有人认为马家浜文化另有来源，分属两个考古学文化。当然不管怎样，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则是明显的，如河姆渡遗址第二层的泥质外红里黑陶、牛耳形的罐等，与马家浜文化的有相似之处，说明了河姆渡文化晚期受了马家浜文化的影响。同时，在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一件作为马家浜文化代表性陶器的残宽檐釜，从其可见马家浜文化的明显影响。^[3]因当时这两种文化区域为钱塘江和杭州湾所隔，它们相互间的交流必须有相应的水上交通工具，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具有跨江渡河的能力。

另外，河姆渡文化向海外传播扩展的史实也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80年代即相继在舟山本岛的定海县白泉遗址、岱山县大巨岛的孙家山遗址发现了明显属河姆渡文化的新石器遗存。白泉遗址出土的陶器“陶质较粗松，烧制火候较低，以素面为主，陶质以夹砂红陶较多，泥质红灰陶较少，还有一些少量的夹炭黑陶。出土器物简单，仅釜、鼎、罐、豆、支座几种。如牛鼻式罐耳、多角沿釜、猪鼻形、象鼻形支座等器物与余姚河姆渡第二、一文化层出土器物相比，在造型和陶质上都基本相同。”^[4] 此处遗址石器出土不多，仅石斧、石镑、石纺轮几种。该遗址的相对年代和余姚河姆渡第二文化层年代

大致相当。“孙家山遗址出土的陶器很多，陶质较硬，仅夹砂红灰陶、泥质红灰陶二系。纹饰花样多，出土器物器型也很多。有：鼎、釜、罐、豆、簋、盆、盘、器盖、支座、壶等。尤其是一件大盘，口径达58厘米。豆、簋等器，与青浦崧泽遗址中层出土的器物相同，有的纹饰也相似。我们认为该遗址的相对年代与余姚河姆第一文化层”⁽²⁵⁾，青浦崧泽遗址中层文化相同。⁽²⁶⁾从遗址附近采集的遗物来看，有的器物表现出较晚的因素，有的已经晚至良渚文化阶段。……从以上二处遗址的实物和遗址的位置来看，当时的生产方式无疑要包括狩猎、农耕、家养畜牧业、鱼捞和大量的蛤蜊等水生动植物的采集在内。这也能说明海岛和沿海地区主要是依靠自己特殊的自然资源而生存。”⁽²⁷⁾

如果说横渡钱塘江或杭州湾，还存在着在枯水季节不用舟筏游泳泅渡的可能性，那么，从大陆到舟山本岛，再由舟山本岛到大巨岛，则非得借助水上工具不可，何况在更远处的嵎泗岛也发现了新石器遗存，那更是不借助舟筏万万不行的。并且，这些岛屿间的出土文物，其年代测定所得的序列与它们同大陆的远近距离恰好成正比。我们知道，河姆渡的四个文化层经碳-14测定，已知其绝对年代：“在送去的30多个标本中，其中第四文化层共测定9个标本，最远的数字是6950年，最近是6570年，平均值为6770年，上限已达7000年。第二文化层测定标本4个，年代平均值为6141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573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000年前后，共延续2000年之久。”⁽²⁸⁾四个文化层叠压关系非常清楚。而位于舟山本岛中部的白泉遗址与河姆渡第二文化层年代大致相当，距今约6000年；而更靠外海的位于岱山县大巨岛的孙家山遗址就与河姆渡第一文化层年代大体相同，有的已晚至良渚文化阶段，距今也有4000-5000年左右。这是完全符合早期先民逐渐向海外拓展的时间顺序的，更可以说明当时河姆文化向东海和黄海沿岸扩散包括稻作文化在内的新石器文化的史实。而当时的人们所能凭借的交通工具，只能是独木舟或筏；所能采用的海上交通方式，也只能是漂流。

另外，1999年9月新华社曾以《台湾“先住民”源自“古越人”》为题发布消息：两岸学者、研究者确认，台湾“先住民”的族源主要是大陆东南地区的古越人。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史式和台湾历史学家黄大受在对台湾发现的大坌坑文化遗址、圆山文化遗址等进行研究后，又将其与代表古越人生活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等进行了较全面的对比。他们认为，在距今6000年到4500年间，台湾先住民中的泰雅、布农等族的祖先就开始从大陆东南沿海陆续迁入台湾，后来又有3次较大的迁入活动。两人的研究成果最近汇集为《台湾先住民中》一书，已由九州图书出版社出版。这部20万余字的著作列举了台湾先住民的风俗习惯中所保留下来的古越遗风，如断发纹身、龙蛇崇拜、缺齿与墨齿、腰机纺织、贯头衣与筒裙、饭稻羹鱼、干栏式建筑、男吹口琴、女吹鼻箫、父子连名、悬棺葬、屈肢葬等等，这些都是台湾先住民源自古越人的有力证据。

专家们分析认为，河姆渡文化绝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不可能单独发生，肯定在其周围还有许多同时期的遗址分布。经过对周围地区的调查、勘察和发掘，“共发现河姆渡文化一期（即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二期即第三文化层，以此类推）以后的遗址30多处。此后，在基本建设中又陆续发现十多处遗址，迄今已达46处。这一个一个的人类早期定居点，基本上分布在杭州湾北岸从萧山至宁波的200公里古海岸线一带，特别是舟山群岛发现的几处河姆渡文化晚期的遗址，进一步表明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时候，河姆渡人已能凭借熟练的水上活动能力跨越大海。”^{〔29〕}从中国出土的史前炭化稻谷遗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也可看出：余姚河姆渡的距今约7000年；宁波一带的距今为6000年左右；舟山本岛的距今5300-5700年之间；台湾省的距今在5000-4000年之间；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距今为3000多年。这里列出的虽然是河姆渡的稻作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但可以想见，同时传承过去的当然还会包括河姆渡文化的其它方面的影响。

假如以地处杭州湾的河姆渡为中心画圆，其稻作文化扩散的半径恰好有

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诸岛和台湾。以地处杭州湾口的上海为起始点，到达大连为1022公里，到达釜山为889公里，到达仁川为932公里，到达山东荣成为850公里，到达日本九州为900公里，到达木浦为600公里，到达济州岛为500公里，到达琉球诸岛为800-900公里，到达台湾基隆为776公里。这个以600-1000公里为半径的范围，恰好与目前所知的5000-3000年的史前稻作遗址分布地域相对应，也恰好与佐佐木高明所画的稻作东传日本示意图中的半圆形凸边石镰的散布地域相对应。这也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大连湾发现了大嘴子稻作遗址而没在锦州一带发现，恰好证明了稻作传播路线无法越过北纬41°从陆路到达辽东半岛，而只能是通过海路传播的问题。上述这些地方围绕长江口呈扇形散开，是海上航线，或者说是海上的漂流路线把稻作文化与这些地方联系起来。而半圆形凸边石镰则是这一海上漂流路线的物证。

为了探究这条远古时代的海上稻作文化传播路线的现实可能性，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原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和韩国探险协会、东国大学共同策划组织实施了'96、'97两届“中韩跨海竹筏漂流学术探险活动”。96年的中韩漂流由于受台风影响，竹筏在距韩国黑山岛不远处改变方向漂抵山东半岛。97年6月15日至7月8日，一名中国队员和四名韩国队员驾驭着最原始的水上交通工具——竹筏，采用最原始的交通方式——漂流，仅凭季风和海流，不用任何机械动力，经过24天波谷浪尖的颠簸，终于从浙江舟山漂流到韩国仁川，完成了人类文献记录中前所未有的壮举。通过两次漂流，确证了以下几点：一、在5月到9月的期间，只要是从长江口漂流出去，在近乎封闭的东海、黄海和渤海的海域中，不是漂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就是折回到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二、对于远古先民来说，他们对方位和距离的掌握只能凭借目力和经验，在目力和经验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一百公里和一千公里对于他们是一回事。他们所以能够东渡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多半不是有目的有准备的计划行为，而是偶然因素使然。但是，在数千年的时间长河中，

一次一次的偶然就变成了必然。三、从河姆渡遗址的发掘结果可以看出，当时的气候条件和生活资源远比现在优越得多，这就为远海漂流中的原始先民提供了必要的生命保障；另外，从现存的原始部落中的人们身上也可知道，原始先民们有着远胜于我们的生存能力。四、竹筏漂流的成功，验证了中国江南与朝鲜半岛包括与日本列岛的海上交往应在青铜器时代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所凭借的交通工具不是船而是筏这样的假设。这就把学术界一般所认为的中国江南与韩国包括与日本的海上交往始于战国时代向前推进了一、二千年。这一学术探险成果的取得，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稻作文化从长江口和杭州湾直接跨海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观点。根据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相对中国长江下游地区呈扇形展开的地形，由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浙江地域漂流到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九州等地的机会应该是基本均等的，这象一把钥匙解答了为什么稻作文化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起始时间不相上下这一悬案。应该看到，从长江口和杭州湾一带到舟山群岛，再到黑山岛群岛或济州岛，再到朝鲜半岛，或经琉球、对马到日本列岛，这不足一千公里的海路上，星罗棋布地撒满了大大小小的岛屿，这都可以成为远古先民的生息之地，它们好象是架设在中韩或中日海上航路上的一块块跳板，连接成稻作文化的东传之途。

注释：

- (1) 游修龄：《稻作史论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3版，第28页。
- (2) 《钱江晚报》1997年7月24日版。
- (3)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见《农业考古》1982年第1、2期。
- (4) 严文明：《略论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和传播》，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2期。
- (5) 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 (6) 主张日本稻作文化传自长江中下游地区，最早见于安藤广太郎出版于1951年的《日本古代稻作史杂考》。

- (7) 佐佐木高明:《稻作以前》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1年版第289页。
- (8) 对于日本石玦与中国玉玦以及日本漆器与河姆渡漆器的联系,蔡凤书提出了否定的说法,见《中日交流的考古研究》,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16~19页。
- (9) 见游修龄:《稻作史论集》第32页。
- (10) 陈文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东传日本的路线》,载《文物》1989年第10期。
- (11) 《高丽亚那》1997年春季号第33页。
- (12) 李春宁:《稻作的文化和韩日关系》,见《韩国古代文化的连联》,(财)韩日文化交流基金编著,1994,第10-11页。韩国沈春谨《韩国的稻作农耕》一文所载年代略有不同,见《农业考古》,1994,第107-108页。
- (13) 年代均根据上文。
- (14)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一),《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 (15) 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 (16) 张居中等:《也论中国栽培稻的起源与东传》,《农业考古》1994,第91页。
- (17) 李洪甫:《连云港地区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第103页。
- (18) (20) 毛昭晰:《先秦时代中国江南和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初探》,1996年10月赴韩国参加东国大学《中韩跨海竹筏漂流探险术研讨会》论文。
- (19) 参看盛永俊太郎等:《稻作日本史》,筑摩书房,1996年。该书附图《日本南方海域·海流图》有图十二幅,自1月到12月每月一幅,有经纬度,海流经过的海域及流向,并标明了流速。
- (21) 张建世编译:《日本学者对绳纹时代从中国传去农作物的追溯》,《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
- (22) (23)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191页,第301页。
- (24)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1期第77-85页。
- (25) 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文物》1976年8期7页。
- (26) 黄宣佩、张明华《青浦县崧泽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1期。
- (27) 王和平、陈金生,《舟山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第9页。
- (28) (29) 邵九华:《中华远古文化之光》,中国百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第90页。

中国稲作文化東傳日本探源

金 健 人

中国の稲作文化は、いつ、どのルートを通じて日本に伝わったのか、この問題についてさまざまな説がある。この問題を解明するために、まず(1) 稲作文化の日本への伝播は必ず朝鮮半島を経由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か、(2) もし朝鮮半島を経由するならばたして水路によるものか、それとも陸路によるものか、という2つの問題を明らか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本論文は、1997年浙江大学（前杭州大学）韓国研究所と韓国探險協会、東国大学の共同チームによって実現した「中韓いかた漂流学術探險活動」の成果を通して、中国稲作文化が朝鮮半島や日本への伝播経路と時代について考察した。